

細的「英雄譜」，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這既非學術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個興趣廣泛的讀書人，以他的眼光、趣味與人脈，勾勒出來的「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某一側影。若天遂人願，舊雨新知不斷加盟，衣食父母繼續捧場，叢書能延續較長一段時間，我相信，這一「圖景」會日漸完善的。

最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第一，作者不限東西南北，只求以漢語寫作；第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目前僅限於人文學；第三，不敢有年齡歧視，但以中年為主——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這三點，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自序

張之洞：生於末世的一代儒臣

杜亞泉：「舊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後的命運

汪精衛：虛無時代的「任性犧牲」

林語堂：戰士、名士與隱士

錢穆：將歷史讀懂、讀通、讀透的大師

巴金：一個終身的安那其主義者

瞿秋白：並非多餘的話

沈從文：與丁玲的歧路分離

丁玲：文人與信徒的雙重靈魂

目錄

169	155	137	119	101	069	049	033	009	001
-----	-----	-----	-----	-----	-----	-----	-----	-----	-----

郭小川：團泊窪秋天的寂寞

郭沫若：一個浪漫主義者的悲劇

李慎之：最後的士大夫，最後的豪傑

王元化：一位中國文化託命之人

作者簡介

著述年表

268 267 251 227 211 201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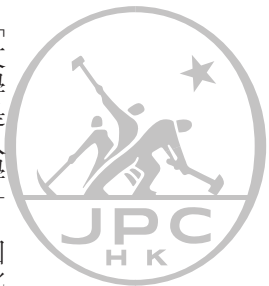
本書中十三篇人物的研究，是我近五年來最新的研究成果。這些人物，基本是知識份子，或者知識份子出身，他們的一生處於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激流險灘之中，隨著民族命運的起伏而上下顛簸。我自己也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從一九八二年畢業留校從事研究以後，就對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有特別的興趣和感受，他們曾經的心路歷程，我們今天還在繼續艱難地行走，無論是思想，還是心態，我們仍然處於老一代知識份子生命的延長線上。

一個學者最合適的研究對象，或許就是他自身，即有著共同基因與文化趣味的同類群體。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葉文心教授，有一次在閒聊的時候，告訴我，在她選擇博士論文題目的時候，他的導師，著名的中國歷史研究大家魏斐德教授，建議她研究民國的員警或者土匪。這讓葉文心非常犯難，這位嚴復的外曾孫女，笑著說：「我們家族出過學者，也出過商人，就沒有出過土匪啊！」後來，她所做的研究，都是與知識份子、商人與

都市文化有關。

我闖入知識份子的研究純屬偶然。留校以後，組織佈置給我的任務是研究中國的民主黨派歷史。我對民主黨派本身的興趣有限，但對民主黨派中的人物——大都是民國著名的大知識份子，卻情有獨鐘，於是從研究黃炎培、沈鈞儒起步，逐漸擴展到更多的知識份子身上。我最早的兩篇有關知識份子的文章，都是在一九八七年發表，一篇是〈中國知識份子群體人格的歷史探索〉，另外一篇是〈從中國的《懺悔錄》看知識份子的心態人格〉，前一篇我從獨立人格角度，考察了古代士大夫到現代知識份子人格的歷史演變，後一篇文章從民國初年的著名記者黃遠生寫的《懺悔錄》，研究中國知識份子內心之中「靈與肉」的衝突，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意外地成為了知識份子研究的專家。更不曾想到的，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期的啟蒙運動「文化熱」中，這些文章竟然得到了廣泛的反響。我當年只有三十歲，幾乎是一夜暴得大名。

我得承認，當年我做這個研究沒有任何功利的念頭，只是出自內心的問題關懷與時代熱情驅使。從一九七七年至今的四十多年，期間我研究過現代思想史、中國文化和城市，但一直對知識份子的研究、特別是知識份子人物的研究有著不可抑制的強烈興趣。個中的緣由，恐怕與我對歷史的理解有關。歷史是什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已經過世的大家錢



谷融先生，當年曾經提出過：「文學是人學」，因此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實，何止是文學，史學也是人學。人類的歷史與自然界的發展不同，雖然有其不可變易的歷史法則，但這些法則卻是在人的自由意志選擇之下而得以實現，甚至改變的。離開了人，歷史什麼都不是。人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他有自覺的理性，也有不自覺的情感、意志乃至潛意識。要深入歷史的深處，就是進入歷史中一個個生命深處，他的所思、所想和所行。人與動物不同，有自由意志，並非僅僅憑生存的本能活著。尤其是知識份子，更是如此。因此，史學就是人學，這個人，不是整體的人民，而是具體的個人，有生命、有溫度、有崇高、也有卑微的精神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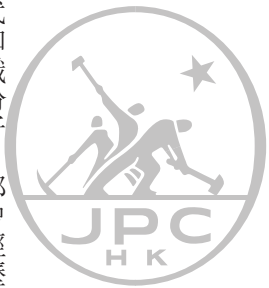
在我曾經寫過的各種文字當中，比較敝帚自珍的，當屬人物的研究。那是一個個活脫脫的生命，嚴肅而緊張的靈魂。我追尋他們的足跡，讀著他們留下的文本，與這些先人同呼吸、共命運。我感覺，我是他們中的一個成員，可以分享他們所有的歡樂與痛苦。每一次書寫他們，就是靈魂的自我反省。他們就活在我的內心。

本書的書名之所以叫做《一個民族的精神史》，乃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聚焦於這個民族的精英——知識份子身上，我們可以從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窺見一個民族的精神深度與缺陷。精神史的書寫，與思想史與文化史不同，它不僅要研究知識份子的觀念形態，也要

觀察他們的情感和意志，以及心態人格。

一個民族的精神史，不僅是整體的歷史，而且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人的歷史。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有自由主義的，有文化或政治保守主義的，也有激進的左翼知識份子。我本人雖然是自由知識份子，但對文化保守主義與左翼思想懷有某種同情性的理解。因此，本書所研究的知識份子對象，有張之洞、杜亞泉和錢穆這三代文化保守主義者，有林語堂、沈從文、李慎之、王元化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也有巴金、瞿秋白、丁玲、郭沫若、郭小川等左翼知識份子，還有汪精衛這個從激進青年最後墮入漢奸的政治文人。

熟悉我研究的讀者或許瞭解，過去我著墨比較多的人物，多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這幾年，我逐漸將關注的重心，轉移向激進的左翼知識份子。個中的緣由，不妨藉本書的出版，透露一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究竟往哪個方向發展？我與許多當代中國的知識份子一樣，都公認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人類普世文明方向的自由民主道路。這條道路，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曾經有過探索，那麼，民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給今天的中國留下了什麼樣的思想與精神遺產？他們的心路歷程曾經遭遇過什麼樣的挫折？這就是我過去三十年研究自由知識份子的中心問題所在。



不過，五四與後五四兩代知識份子，都曾經歷過漫長的革命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都一度以為，革命那一頁，永久地翻過去了。然而，歷史的發展是那樣地弔詭，那已經翻過去的一頁，似乎又重新回來了。那麼，革命的邏輯究竟何在？革命與知識份子的關係究竟如何？進一步言之，我的少年歲月，是在毛澤東的紅色年代長大。我們這一代，如同崔健的歌所唱的，都是「紅旗下的蛋」，與如今「國旗下的蛋」九〇後一代，在思想觀念和精神氣質上迥然不同。不管你成年以後從事什麼研究，到你生命的老年，都會不由自主地回到童年，想清算曾經歷過的青春歲月。不僅我個人如此，我同時代的多位學者朋友都是這樣。並非偶然地，在中國學術界，這幾年出現了一股小小的「新革命史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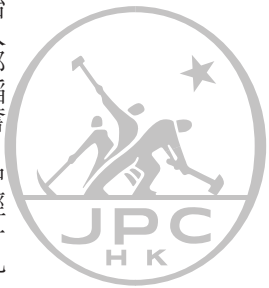
我並不想追逐這股新的熱潮，只是想盤點自己的少年時代而已。於是，這幾年我對上一代左翼知識份子的心靈與精神世界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知識份子投身革命，與底層的工人農民不同，並非窮則思變，為了實際的利益，而往往是與思想與心理的巨變有關，他們為了追求一個夢想，一個正義、自由的美麗新世界。那麼，二十世紀的三場最重要的革命：辛亥革命、國民大革命和中共革命，特別是後者，究竟具有什麼樣的神魅與魔力，讓知識份子拋棄了原本確定的個人前途，捨身加入革命的狂潮呢？中國革命的世俗宗

教性何在？什麼樣的知識份子最容易成為革命者？這與他們家庭出身與個人遭際有什麼關係？這都是之前的革命史研究很少觸及的問題，這幾年我對這些問題，開始投入研究與思考。我的工作方式，通常是從個案做起，只有更多的個案積累，才能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知識份子的整體圖景，有鳥瞰式的瞭解。

本書中將近一半的知識份子個案，都與我近年來的這些思考有關，對上述令我疑惑的歷史迷案，也有一些初步的嘗試性闡釋，藉本書出版之際，我很期待讀者的批評和回應。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香港三聯書店，這已經是我在該社出版的第三本繁體字著作了。最初的一本是一九九二年出版的《精神的煉獄：文化變遷中的中國知識份子》，這是我最早的一本研究中國知識份子論文集。第二本是去年面世的《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前兩本都是先有簡體字版，香港三聯再推出繁體字版。而本書，首發的是繁體字版，我期待終有一天，也能夠在內地推出簡體字版。

感謝香港三聯的顧瑜老師與我聯繫，促成了本書的出版，而李斌，已經是第二次擔任我的書的責編了，他的認真和細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的三家三聯書店，無論是北京、上海的，還是香港的，都具有濃郁的知識份子關懷和氣息，與三聯的合作，本身就是一種精神氣質上的投緣。誠如在十多年前，我在一篇專文中說過，三聯的精神，就是



知識份子的精神，從她的創始人鄒韜奮，中經一九八〇年代，直到今天，三聯的知識份子精神弦歌不絕，薪火長存。

向三聯致敬，向知識份子精神致敬。

作者謹識

二〇一九年三月於滬上櫻園

張之洞：生於末世的一代儒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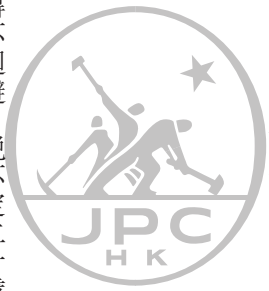


晚清是一個國破山河在的危世，也是一個很有魅力的時代。危世出豪傑，從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到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這些漢族封疆大吏是晚清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連慈禧太后都要顧忌他們三分，既要重用又要盯防。假如沒有了他們，大清或許提早六十年就會完蛋，變成洪秀全的江山了。

曾國藩、李鴻章和袁世凱，世人已經談得夠多。而以「中體西用」而聞名的一代儒臣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年），其實更值得一說。他比其他幾位前輩同僚更為複雜、多面，轉變大時代中的所有尷尬和衝突，都在他的人格心態中濃縮地展現。

張之洞出生在河北南皮。河北在清代叫做直隸，負有拱衛京師的重責。晚清一代，此地人才迭出，足可與江南比肩，不似今天有點衰敗。張之洞的祖輩是世受皇恩的官宦之家，不是進士，就是舉人，但官最高的也只做到按察使一級。真正讓家族光宗耀祖的，還要數張之洞。他出生後的第三年，鴉片戰爭爆發，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時代」降臨，讓本來飽讀四書五經的儒生們有了斬露頭角的機會。亂世出英雄，時代成就了張之洞，讓他達到了祖輩無法企及的高度。

張之洞天生聰穎，是塊讀書的好料，考試更為了得，十三歲中秀才，十六歲順天鄉試拔得頭籌，以解元身份中舉，二十六歲中會試第三名，俗稱探花。要不是中舉之後有兩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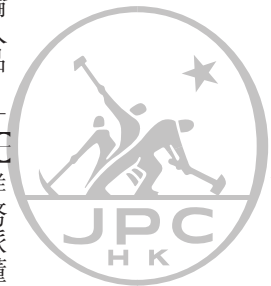
會試，因為考官中有族兄不得不迴避，說不定二十歲就能以進士身份點翰林。正途出身，少年得志，這讓張之洞一生都引以為豪，自信滿滿。

清末那幾位大名鼎鼎的治世能臣，除了李鴻章是二甲出身，與張之洞勉強比肩，其他幾位在功名上都與他差了幾個層次。名氣最大的曾國藩，雖然也入殿試之門，成績卻在三甲，「賜同進士出身」而已，曾公常常引以為恥，有自卑之感。而功勳顯著的湘軍將領、後來擔任封疆大吏的左宗棠、劉坤一，一個是舉人出身，另一個是級別更低的廩生。至於比張之洞低半輩的袁世凱，更是屢屢鄉試不中，非正途之人。張之洞有資格驕傲，所以自視甚高。他的用人標準，也十分苛刻，首看門第出身，次看科甲正途，再選飽讀經書的儒學名士。他的眼中，只有兩種人，一種是他看得起的，另一種是他看不起的。這與曾國藩虛懷若谷，不問出身，廣招天下人才於幕府之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點了翰林之後，張之洞在京做了幾年閒官。同治光緒年間的官場，位少人多，因鎮壓太平軍而崛起的湘淮軍人，以軍功佔據了大半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的職位；朝廷缺錢，又讓一批雜佐以銀子鋪路，以捐納擠入官場。於是鳩佔鵲巢，仕途擁擠，本來等著外放的翰林們就前途無望了。他們懷才不遇，牢騷滿腹，同味相投，於是以軍機大臣李鴻藻為首領，形成了一個清流黨。李軍機是張之洞河北的同鄉前輩，清流的風格又很對自己的口

味，張之洞便毫不猶豫入了夥，成為與張佩綸齊名的清流黨大將。清流個個正途出身，滿腹經綸，看不起當時炙手可熱的「濁流」洋務派封疆大吏，譏笑他們不過是「粗才俗吏」。清流、濁流，各成一個交往圈子，各有各的趣味與做派，形成同光年間的死對頭。執掌權力的慈禧太后也樂見藉助清流的勢力，牽制如日中天的恭親王和李鴻章這些洋務派官員。

說起慈禧太后，對張之洞而言，不啻有知遇之恩。他少年得志，名聲在外，連慈禧都有耳聞。據傳慈禧太后還當面問過她的寵臣、張之洞的族兄張之萬：「你弟弟張之洞頗負才名，怎麼至今還沒有入翰林？」第二年張之洞參加殿試，閱卷大臣認為他的對策「出格」，判為三甲之末，若如此的話，張之洞與曾國藩一樣，都只能是「賜同進士出身」，將為一生之恥。戶部尚書寶鋆獨賞此才，將之提置二甲之首。到了慈禧那裏，御筆一勾，將第三、第四名對調，二甲之首的張之洞躍入一甲，成為探花。太后如此之「簾眷」，讓張之洞感恩不盡。皇恩浩盪，當以終身報答。晚清政壇風雲激盪，每當重大的時刻，張之洞總是堅定地站在慈禧的「后黨」一邊，除了他深諳宮廷政治，明白「跟對人」很重要之外，恐怕與儒生「士為知己者死」的報恩之情也有關係。這種情感，對於不講君臣之義、只問功利利害的袁世凱來說，是斷斷不會有的。



同光年間的清流黨，最大的政敵是李鴻章。在張之洞他們看來，李中堂是「但論功利

而不論氣節，但論材能而不論人品。」^{【一】}洋務派懂得天下之「勢」，卻忘卻了聖人之道。而飽讀經義的清流黨們，「以維持名教為己任」，自然要對庸俗的洋務派官員大加抨擊。張佩綸是有名的大炮，他彈劾的官員，從滿族權貴奕訢、崇厚，到漢族官員翁同龢、郭嵩燾，不問南北，皆在橫掃之列，連他的恩師寶鋆、親家王文韶，也大義滅親，決不放過。張之洞則要乖巧得多，他懂人情世故，只是正面提出建言，即使有批評，也是對事不對人，很少有糾彈官員之舉。他的上疏得到各方賞識，更為慈禧所另眼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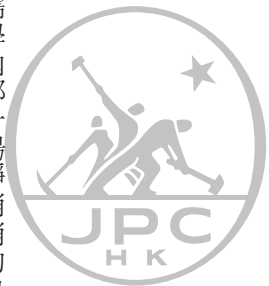
假如張之洞沒有機會外放，大概他終身會成為清流的死忠黨。偏偏不久機會來了，朝廷命他出任山西巡撫。在這之前，雖然做過兩任欽差學政，他並沒有主管行政的州縣地方官的經歷。因為有慈禧的眷顧和同鄉李鴻藻的關照，竟然越級提拔，獲得「特擢」，成為封疆大吏。這是張之洞人生的最大轉折點。在翰林院任職，儘管放言高論，應該如何如何，不必為結果擔責。一旦主掌地方，就不得不以政績證明自己。張之洞是何等聰明之人，他明白，世道已經變了，假如不懂洋務，便實現不了富強，而在一個競爭的世界，富

【一】 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聞》，黃興濤編，《辜鴻銘文集》上冊，海口：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四一八。

強正是是生存之本。

從山西巡撫開始，到後來的兩廣總督、湖廣總督任上，二十多年的封疆大吏生涯，讓他從一個高談闊論的清流黨，變為一個注重富強的洋務派。特別在他督鄂的十八年，視武漢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大力施展湖北新政，後來居上，將原本落後的武漢打造成為僅次於上海的洋務重鎮。最出名的漢陽兵工廠，生產的槍炮，其質量與數量都在上海、天津之上。武漢這個華中通衢之都，有今日之地位，首先要感謝的是張之洞在清末的首功。

但不要以為張之洞真的搖身一變成為完全的洋務派，實際上他是清流為本，洋務為用。清流與洋務構成了他一生的內心緊張，後來他在《勸學篇》中，以「中體西用」的模式加以安頓。事實上，辦洋務，並非違背聖人義理。洋務事業，從經世致用而來。儒家之義，本來就有兩面，一面是修身，注重道德修養；另一面是經世，落實於社會政治治理。經世而不修身，那是法家的吏道；修身而不經世，則與道家佛教無異。儒家與法家、佛老不同之處在於，它既有修身的超越層面，又有經世的世俗性格，在不同的朝代和時期，會有不同的側重點。宋明兩朝，從朱熹到王陽明，都以修身為本，到了明末清初，顧炎武振臂一呼，一反空疏的心性之學，提倡通經致用。雖然清代中葉文人們戰戰兢兢，埋頭於繁瑣的考據之學，但到了晚清，在變化的大勢刺激之下，經世致用之風再起，成為洋務運動



的先聲。辦洋務，本身就是儒學內部一場靜悄悄的自我變革，它繼經世而來，是經世之術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在西風吹拂之下經世的新階段、再發展，未必違背聖人之學。從曾國藩到張之洞，皆可作如此觀。

張之洞最欣賞的是「通經致用」，早在擔任四川學政的時候，他在成都創辦尊經書院，提出治學、讀書、習史的根底在於「通經」，熟讀儒家經典。但是，通經不是目的，最終乃是要「歸於有用」。他說「讀書趨於明理，明理歸於致用」。張之洞以飽學之士聞名，其讀書之多之雜，在同治年間無時人可比。他給尊經書院的門生開列了二千餘種書目，後來作為《書目答問》一書傳佈全國，成為當時士人們首選的讀書指南，其中大部分是經史子集的傳統經典，也有幾冊翻譯的西學著作，比如《新譯西洋兵書五種》、《新譯幾何原本》、《代數術》、《數學啟蒙》、《瀛環志略》、《海國圖志》、《新譯地理備考》、《新譯海道圖說》等。清末的啟蒙巨擘梁啟超少年時代埋頭於科舉，不知天地間除了輔導科考的帖括之外還有另外的學問。待他讀了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頓開茅塞，始知天下還有學問二字。直到七年以後經過上海，才看到了張之洞所開列的這些西書。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也好不到哪裏去，他讀到《書目答問》中西書的時間，也不比張之洞更早。

張之洞的經世致用之學，啟蒙了梁啟超這批後來的維新之士，在引進西學、採用西法